

发达地区的农民生活品质提升:现状与问题

——基于杭州市萧山区两镇的实证研究

龚上华 柯红波

【摘要】基于杭州市萧山区两镇调查数据的剖析可知,当前发达地区农民对生活品质建设等民生问题的解决满意度较高,但当前农民生活品质提升仍面临许多问题与影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农村的未来发展,以新型乡村精神共同体建设为载体,乡村的各种资源优化配置、各项政策制度成龙配套、治理策略和手段的调整、公共物品和服务提供、基层制度建设及农民信仰与意识形态社会化整合等是促进农民生活品质提升的新路径。

【摘要】农民;生活品质;新型乡村精神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16)04-0082-008

一、引言

人类文明的历史,既是人类物质和精神文化发展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人类的生活品质需要不断引发、生成、满足、拓展和创造的历史。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人们的生活品质追求各自带有自己所处时代的烙印和历史的痕迹。当生产力的进步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丰富的物

质生活已不再是追求的唯一目标时,步入小康阶段后的农民对生活品质的需求就变得愈发强烈。提升农民生活品质,促进社会事业发展,对于促进当代中国农村社会走向有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0

所谓生活品质是指人们日常生活的品位和质量,包括经济、文化、政治、社会及环境“五大品质”,其中社会生活品质包含社会活力、社会公平、社会秩序等;环境生活品质包含自然环境、景观环境、设施环境等。生活品质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概念,它的构成通常可以分为两个主要方面即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客观的生活品质涵盖了生活的有形方面和可以客观地证实的方面;而主观的生活品质则涵盖了对生活的主观看法,这些看法可以通过有关生活满意程度和幸福体验的测试得以量化。本文主要探讨农民的社会生活品质和环境生活品质。

居民生活品质研究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在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较为流行的民众生存状况评价工具,成为评价一个城市生活质量、发展水平的标志性指标。如美国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中,安全感是良好的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控制感指收入高、寿命长、健康状况良好、家庭稳定。在国内,社会事业指标被摆到生活品质重要位置:社会事业与人民日常生活休戚相关,能够更加有效地反映人民享受发展成果的水平。如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的“生、老、病、死”4个评价指标均涉及社会事业。深圳的社会和谐满意度评价大量问题涉及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因此,社会发展指标成为城市发展评价指标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为了提升城市的品质,2007年以来,杭州市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基础上发起了建设生活品质之城的学术大讨论,如关于生活品质评价体系的讨论;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生活品质提升与国民快乐幸福的大讨论关于提升农民以及农民工生活品质的研究^①等等,在国内学界和政府部门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也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支撑。不断加速的城镇化进程也在不断影响和改变发达地区农民的生活品质,农民对公共服务和基本公共服务在内的服务主观感受和满意程度直接影响到对社会发展的评价。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②为了更清楚地了解和掌握农民的生活品质状况,课题组以浙江农民个体为分析对象。因为浙江独特的区域特征、事功文化、半工半农经济发展的形态特色使之在中国更具有典范性。这里的“农民”是从较宽泛意义上来谈,既指农业劳动者,又指农村居民,也指长期流动在外、但户籍仍在原地的农民工,还指保有一份集体所有的土地、在乡村从事非农行业的工作者,在设计调查问卷时,还包括部

分农村干部人群（绝大多数为村委层面的农村干部，仅有极个别乡镇干部）。

本项问卷调查于 2009 年 5 月、2011 年 7 月在杭州市萧山区分两次进行。杭州市萧山区是浙江省的首批小康县（市），国内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等主要经济指标实绩居浙江省县（市、区）级 f 位。2013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673 亿元，按户籍人口计算的人均 GDP 达到 130797 元，是典型的发达地区。课题组分别于 2009 年 5 月 12 日至 15 日在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发放“建国以来发达地区农民思想观念变迁调查问卷”，本次共发放调查问卷 530 份，收回有效问卷 509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6%；按调查对象年龄结构来看，40 岁以下占 62.5%，40-60 岁占 30.2%，60 岁以上的占 3.2%；从性别来看，男性占 57.2%，女性占 42.8%；从政治面貌来看，党员占 15.4%，非党员占 84.6%；从婚姻状况来看，已婚的占 62.2%，未婚的占 37%，其他占 0.8%。2011 年 7 月 5 日至 9 日在萧山区党湾镇再次发放同样问卷，本次共发放调查问卷 290 份，收回有效问卷 277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5.5%；按年龄结构来看，40 岁以下占 74.5%，40-60 岁占 20.4%，60 岁以上的占 5.1%；从性别来看，男性占 68.6%，女性占 31.4%；从政治面貌来看，党员占 16.2%，非党员占 83.8%；婚姻状况来看，已婚的占 60.3%，未婚的占 39%，其他占 0.7%。全部问卷资料经检查核实后进行编码，输入计算机，运用 SPSS11.5 社会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并得出结果。

二、发达地区农民生活品质认知现状

依据社会生活品质以及环境生活品质的定义，农民社会生活品质认知包括城乡一体化意识变化以及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渠道、方式的认知程度，尤其是对农村城镇化认识的思想观念变化，包括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现象、城镇化进程中环境污染问题、城镇化趋势接受程度；对社会福利、医疗保障、教育资源、社会治安等方面的认识情况；对贫富差异和城乡差异等结构分化差异及其运行方式的认知情况；对居住环境、人际关系、自身地位等的认同情况；对人口流动、就业状况以及农村未来发展前景等方面的认识情况。本文主要选择城乡一体化意识、公共环境意识、社会保障意识、社会交往意识等四个核心要素进行分析。

（一）农民对城乡一体化表现出接纳与忧虑并存的矛盾心态

城乡一体化是我国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让农民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样的文明和实惠。城镇化是走向城乡一体化的必由之路，本文选择农民对城镇化的态度来分析城乡一体化意识。调查显示，农民对城乡一体化表现出接纳与忧虑并存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城镇化是一种大趋势，在这种城镇化发展趋势中，农民总体上是持支持态度的，即适时转型，随机应变。一是城镇化对农民来说，首先意味着赖以生存的土地的失去，农民思想上必须接受转变。1985 年至 1995 年十年间我国农村耕地面积与城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表明，在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城镇化越发展，农村耕地面积是逐年减少的。二是城镇化对农民来说，也意味着产业结构的转变，农民必须适时转型。三是城镇化对农民来说，意味着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农民必须逐渐适应。如被访人周某说：“我儿子和女儿都在萧山城镇工作，周末有空的时候来看看我，现在交通也很方便，有时候我们也会感觉到寂寞，毕竟老人喜欢热闹，不过也可以接受，毕竟社会在发展，我们也要跟着时代走嘛。”

另一方面，城镇化是必然趋势，在这种城镇化发展趋势中，农民对转型所涉及的关系未来生活的切身利益毕竟有一些忧虑：一是对农转非的担心和忧虑。当前，乡村人口进入城市的迁移成本及障碍逐步减少，二元社会正被逐步打破，但是，当地政府为居民提供各种服务仍以户籍为依据，城镇化进程中农民担心无法享受到同等的居民待遇，忧虑被现有城市管理体制排除。二是对社会保障的忧虑。当前，随着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浙江人口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那就是不断增加的城镇人口和不断减少的农村人口，在现实中表现为农民工和失地农民的不断增长，给现行养老保障制度带来了挑战，突出的表现为农民工和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一方面，农民工兼具身份上的农民和职业上的产业工人双重身份，由于制度性缺陷，使得农民工这个弱势群体日益被边缘化，加剧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困境。另一方面，快速城镇化进程使得土地占用也逐年增加，意味着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数目巨大且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短期内由于征地款的存在可使失地农民生活总体保持稳定，心态基本平稳；但从长远看，由于征地补偿、再就业、社会保障等制度的不完善，部分失地农民可能陷入新的社会保障困境。

（二）农民对公共环境意识有大幅度增强但又容易陷入“邻避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浙江大力加强城乡绿化美化一体化建设，有力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方便了城乡文化经济的交流。纵观农民的态度来看，农民对

公共环境改善取得的成绩持非常肯定的态度，生态意识较前有较大的提升。

一是农民对公共环境取得的成绩持肯定态度。从“对本村公共场所的环境满意度状况调查”以及“对所在村镇的绿地面积满意度状况调查”问卷反映的情况来看，村民对所在村镇的绿地面积以及公共场所环境的满意度均达到 59%，仅有不到 10%的人表示不太满意。访谈也充分显示农民对农村公共环境建设的满意度，如被访人朱某说，“以前我们这根本也没什么路的。现在的规划比以前好多了，而且这路也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宽、越来越亮的”。又如“现在的卫生条件好多了，村容村貌很好，路上扫垃圾的也一天到晚扫。”所以，当问及“对居住村子的总体看法”时，25.1%表示非常喜欢，35.8%的人表示比较喜欢。可见，超过 6 成人表示满意，仅有不到 9%的人表示不太喜欢。

二是农民的生态意识较前有较大的提升同时有所忧虑。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政府和民众对农村生态环境越来越重视。如被访人张某说：“村里的环境和以前的环境来比肯定会差一点，现在我们镇里纺织是第一产业，噪音很大的，工业废水也有的，五金的会好点。村里的水是吃都不能吃的，治理是有的，下水道都会引到一个地方，就像污水处理的总站。”以张某为代表的农民对城镇化带来的环境污染的关注并不仅仅是感叹环境的恶化，更多的是对个人、企业和政府在环保问题上如何各司其职，共同做好环保工作。在城镇化进程中，工业生产比例逐渐升高，对原来的生活环境产生的影响面还是比较广的，从问卷中也可以看到，当问及“您对所在村镇的空气质量是否满意”时，仍然有近三成的人表示不满意，居中态度的也有将近四成。此外，近年来，农民环境信访和维权频发，抗争事件也时有发生，如 2011 年衙前镇永前布业环境污染问题。该厂未经环保审批擅自增加两条涂层上糊生产线，原有废气处理设备无法彻底处理现有涂层设备产生的废气，导致废气未经处理直接排放环境。又如 2005 年浙江省东阳市画水镇农民集体抗议当地化工企业所造成的极其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浙江省新昌县逾万名农民抗议京新药业污染环境事件以及杭州余杭中泰垃圾焚烧厂项目引发聚集抗议等等，这恰恰反映了农民生态意识的提升，也反映出高度情绪化的邻避主义。可见，农民对污染有着自己的认识和规划，这体现了农民的忧虑，也反映了农民环保意识的提升，同时也反映出对农民加强环保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三）农民社会保障意识和诉求有大幅度提高但又心存忧虑

社会保障即国家和社会依法对社会成员基本生活给予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是各种具有经济福利性的、社会化的国民生活保障系统的总称。社会保障是影响农民总体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既可以提升农民的生活满意度，也可以避免社会动荡、维持社会稳定。发达地区农民对社会保障建设具有广泛认同。当问及“您对本村（社区）的医疗保障满意度如何”时，问卷结果显示，有 31.3%的人表示“非常满意”，39.2%的人表示“比较满意”，满意度高达 70.5%。2011 年我们调查了党湾镇当地居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满意度，在 277 人中表示非常满意的有 106 人，占 38.27%，比较满意的有 122 人，占 44.04%，二者加起来达到 82.31%，可见满意率还是较高的。这种高满意度与社会建设是分不开的，据党湾镇梅东村一名当地的沈医生说：“现在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药价降下来了，现在是药品零差价，收支两条线，农民有农保卡，大病去大医院可以报销的 3 我们本村村民有体检，每年都做，免费的，常规性检查一年一次，免费的。”党湾镇幸福村的沈某如是说：“关于医疗这块，大部分是国家补贴，农户出很少一部分，参保率达到 98%，农户每个人出资 130 元，农户出资比例不是很大的，最多 30%，报销的比例在我们乡卫生院能够提高到 40%。”可见，从问卷和访谈来看，农民对社会保障高满意度是显而易见的。

对农民来说，利好不断，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家庭规模小型化的变化，农民对社会保障尤其是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的需求会越来越高。一是人口老龄化状态下农村居民养老忧虑度有所提升，其根本原因在于当前社会救助体系不健全，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突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难以适应城镇化与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需要等。因此，面临如何克服老年抚养系数增大和社会保障系统负担加重的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老年人口数量进一步增加，社会如何提供与之相适应的各类保障，形成善待老人、使之安享晚年的和谐氛围，这对整个社会的社会保障及社会道德水准等都面临着巨大变化和挑战。二是家庭规模的逐步小型化使农民对整个社会抚养体系产生忧虑。对农民来说，在子女众多的情况下，子女之间可以协商分担养老负担。现在家庭子女的数量越来越少，不管以哪种方式分摊，每个子女分摊的养老费用都会增加，进而养老压力增大。虽然调查显示，被调查者有近 7 成农民表示非常愿意婚后与长辈共同生活，但是，客观上，由于家庭规模的不断小型化，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口失去了传统家庭养老的基础，老年人口养老将更多地转向依靠社会和政府，从而对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提出了迫切需求。

（四）农民社会交往意识呈现出传统与现代的交融

社会交往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相互往来，进行物质、精神交流的社会活动。新时期，发达地区农民社会交往意识呈现出传统与现代的交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交往工具上选择性增加使交往范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杭州市全市每百户农村居民家庭拥有家用汽车 27 辆。这个数据非常惊人。据萧山衙前调查显示，农民到附近的城镇首选的交通工具呈现多样性，公交车和私家车分别占到 39.2%和 21.9%，二者相加达到 60%以上，此外，摩托车和自行车也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分别占到 16.5%和 19.5%。由于交通工具的普及尤其是汽车的大量使用，拓展了农民的交通半径，为农民交往提供了便利。

二是农民的交往环境变化较大。从纵向来看，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交往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导致社会交往之间的落差巨大。首先，人们之间的交往面临贫富差距的困扰，平等交往受到一定影响。萧山衙前调研显示，当问及“您认为本村的贫富差距情况”时，农民认为“非常严重”的占 22.4%，“比较严重”的占 42.4%，“不严重”的占 26.5%，表示“不知道”的占 8.8%。访谈中，农民认为人们之间的交往面临贫富差距的困扰。例如，被访人言某表示：“我们年轻的时候，很穷，大家都穷开心。那个时候饭也没得吃，吃番薯萝卜粗粮，但是很开心，人活得没有压力。现在生活条件是好了，但是压力很大，外面竞争很激烈。以前没有竞争，大家都在一起干活，现在是各人管自己，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太大了，人活得很紧张，相互之间感情也淡薄了。”其次，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逐渐走向市场化、规则化、现代化，人情化、传统化逐渐减弱。调查显示，当问及“农民对致富最需要的是什么的看法”时，农民更多地选择“致富是靠个人奋斗”（41.9%），其次是“政府帮助”（35.6%），再次是“亲戚朋友的帮助”（14.8%），其他为 7.7%，这与传统时期更多地依靠亲戚朋友的帮助大为不同。此外，从打借条的例子也能证明其变化。当问及“您借钱给别人时会不会打借条”时，认为“必须打借条”的占 31.7%；认为“应该打借条，但也要看对方是谁”的占 49.4%，二者加起来高达 81.1%，而认为“都是乡里乡亲，无所谓”以及“不应该打借条”的仅占 18.9%，尚不到两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意味着传统宗族型的交往方式逐渐式微，而市场经济中对个人奋斗以及崇尚法治的精神却增长较快。

三是农民交往对象及交往情感变化极大。从横向来看，农民工的出现，使交往的对象发生了巨大变化，交往的情感有了深度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发展迅猛，这种趋势直接辐射到广大的农村发达地区，发达地区农村大量人口流入城市，内地大量农民工不仅涌进发达地区城镇，而且也涌进广大的发达地区农村。农村本地居民对外地务工人员总体表现出好感和接纳，但也存在一定的心理距离。当问及“您认为在此打工的农民工的生活状况如何”时，近九成的人表示外地务工人员非常辛苦。当问及“您认为外来务工人员对当地百姓生活的影响”时，38.8%的人表示影响非常大，22.2%表示影响比较大，可见 61%认为影响比较大的。而农民工只有 14.2%的人与本地居民或社区邻居交往。并且，他们与本地居民的社会交往呈现表层性特征，只涉及利益关系。因此，促进二者融合有助于提升农民的品质意识，促进农村社区和谐。

三、当前农民生活品质提升中的主要问题与影响因素

应该肯定，现阶段农民对生活品质追求的主流是文明、健康、向上的，浙江农民以其积极的市场经济意识和敢为天下先的进取意识也得到了世人的肯定。但也应该看到，当前农民生活品质提升中还存在许多问题与影响因素，如物质条件方面的制约、制度条件方面的制约以及文化思想条件方面的制约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农村的未来发展。

（一）物质条件方面的制约

从物质条件来看，当前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过去长时期二元经济结构下偏好城市、偏好工业的政府行为，导致现阶段农民收入增速不断下降，城乡公共服务水平仍然不均衡，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仍呈扩大趋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任务还非常艰巨，这些问题势必影响农民生活品质的提高。因此，如何通过加快推进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以及劳动就业等方面的一体化，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从多层面多角度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民收入多元化；如何大力发展乡村经济，如大力发展有竞争优势的特色经济，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快建设高效生态、优质安全、经营集约、功能多元、发展持续具有区域特色的现代农业，完善农村物流体系，引导农村建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如何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

变，努力实现农业投入集约化、资源配置市场化、生产手段科技化、经营方式产业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益，提高农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加快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发展农村金融政策，促进农民增收，从而为农民生活品质提升提供有力的支撑就成为新时期发达地区农民生活品质提升的课题之一。

（二）制度条件方面的制约

从制度条件来看，长期以来，由于国家工业化的需要，在对待农民问题上尚存在着制度上和政策上的偏差，如何提升由于社会发展不足所带来的公共服务滞后和能力不足等问题，如何协调好外地人口在户籍制度、社会福利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等方面的不均等，真正吸纳他们融入当地社区等等，都是制约发达地区农民生活品质提升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探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服务均等化机制，为提升农民社会生活品质创造良好的条件，政府如何抓住重点，将公共产品供给的重点放在能直接改善农民生产和生活环境方面来，为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如何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力量的作用，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农村建设，允许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等社会组织在农村兴办各类事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如何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如何明确政府主体在农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职责和范围，建立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均等化相适应的县乡财政体制，确保其可持续发展；如何整合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就业保障体系、工伤保障体系、生育保障体系、社会救助体系、社会福利体系和社会优抚体系等多方面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构建一体化的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为农民社会生活品质意识提升提供重要的支持；如何加快福利保障制度改革，进一步消除农民进城的各种障碍，为农民有序流动提供支撑以及如何确保进城农民工能够享受到与当地城市居民在子女教育、医疗服务、失业保险等方面同等的福利保障待遇，等等，成为了新时期提升农民生活品质的重要课题。

（三）文化思想条件方面的制约

从文化思想条件来看，随着社会进入快速转型期，农村社会经济成分、生产领域、组织形式、经济利益、就业方式的多样化，导致了农民的思想观念、道德意识、价值取向、文化认同趋于多样化，以利益多元化和经济运行市场化为基础内涵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直接促成了相对自主性社会的形成，而且使得社会分化和利益多元化，社会异质性增加，这种多元化的利益格局使农民在过去一元化状态下形成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心理素质发生了变化，并呈现出不平衡和多样性的特点，进而引发一系列的心理矛盾，尤其表现为目前农民生活品质追求中的不文明心理，这些对农民生活品质提升影响较多，具体表现在以下三大方面：

1、住房消费中的攀比心理。在住房条件得到极大改善时，农户消费心理、消费观念上也发生了改变，较为明显的表现就是攀比心理。目前，住房除了可以满足居住的需求外，同时也成为农户体现自身价值、彰显社会地位的一种方式。在农村，房子是农户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象征，是农户的生产经营能力及经济实力的最直接体现。调查发现，富裕起来的萧山衙前农民，有“建房如更衣”的“建房一拆房一再建房”循环冲动，以前挣钱是填肚子，现在攒钱为盖房子。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农民普遍存在的攀比心理问题。项某说：“我们村就是这十几年发展起来的。我们这个村普遍还是比价富裕，做轻纺生意的。现在我们有钱的话，攀比心很强，都想把房子建高大，但是上面管得很严，几十万几百万都是这样造，所以整个村看上去都差不多。”笔者在走访其他村与农户交谈后也了解到大多农民家中三楼四楼都是闲置的，有些村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空房，因为主人或在外发展，或住在单位里，或在萧山城区有房。

2、婚庆文化中的铺张心理。婚庆观念具体来说指婚礼流程具体实施形式的选择以及各项过程的安排意愿。不同时代的婚礼折射出不同时代的特点。从建国初期发展到如今，婚庆方式演变到如今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这与建国初期简单朴实的结婚方式不可同日而语。进入20世纪90年代，一方面是婚庆方式出现了“个性化色彩更明显”的优点，“集体婚礼、旅游结婚、派对婚礼……结婚的方式越来越趋向多样化”；另外一面存在婚庆仪式的繁杂和铺张，“拍好几千的婚纱照，摄制婚礼录像、婚车当道……”。婚礼的消费由几十年前的几十元，发展到现今的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一味追求新颖独特的婚礼容易造成铺张浪费，演变成以规模和投入为标准的炫耀和攀比，对父母、对新婚夫妇都于事无益。但是为人父母，面对儿女的婚事，当然还是希望办得热闹体面。就像施某说的：“现在结婚好看是好看，就是冤枉钱花的多，不值得。不过家家都这样办，农村婚礼就讲求个热闹，不办也不行。再说了，我们结婚的时候太简单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自然要给子女风光光办一回。”^②农民对于子女婚庆一方面是具有拒绝铺张与豪华的真实情感，同时内心又无法抗拒并选择从众的铺张行为。

3、丧葬文化的浪费心理。在传统文化中，丧葬礼俗被视为可以加强宗族血脉联系的重要

活动。当代学者们已经认识到，随着农村的富裕与农民的自由，有的传统习俗重新复兴，复古的习俗往往与时代相悖，加大了农民的经济负担与精神压力。不少地区的农村为原本非功利性的农村习俗增加了很多的功利性，如殡葬事宜，原本为邻居相互帮忙，而演变为雇佣服务关系（专业服务队来完成），农忙季节或修改房屋，原本也是邻居相互帮助，而现在演变为打工，这样使相互帮助的关系转变为雇佣关系，情义关系转变为利益关系。追求功利的另外一个重要表现是殡葬等方面出现高消费，且还在节节攀升，这样使有些家庭因此重新陷入贫困，使更多的人感到“跟不上”而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衙前镇农村也出现类似的趋势，特别是部分富裕家庭借助给家中老人办白喜事的机会，讲大排场大气势，除了邀请家族的人员帮忙之外，还会雇佣专业服务队来助阵。丧事办理过后，有些不和睦的家庭还会因为过高的丧葬费用的分摊问题而争吵，严重影响了家庭的和谐和生活品质的内涵。

四、农民生活品质提升的导向

农民生活品质提升是个重大的系统工程，其目标是建立一种有别于城市文化，也有别于以往农村传统文化的一种新型乡村精神共同体形态，表现为农民在思想观念、道德规范、知识水平、素质修养、行为操守上的提升，从而“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文化内涵、社会风气和精神风貌”。反映的是农村一种共同的内在精神。不言而喻，一种高尚文明的乡村社区精神共同体是农民生活品质建设的内在要求和逻辑归宿，也是引领农村生活共同体走向的风向标。

精神共同体是指“人类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和组织形态”，“具备一定的内部结构和生成方式”，“精神共同体的内在结构主要是指精神共同体内在具体的组成要素及其相互联系的方式”。农民精神共同体是具有共同志趣、共同价值追求的人们为了满足主体心理、情感、意志等精神方面的需要所结合起来的共同体。也就是说，农民精神共同体是一个以共同的志趣和共同的价值追求作为其内核，由主观认同这一志趣和价值追求的农民个体为成员所形成的一种精神场域。只有当农民个体认同并自觉捍卫共同的精神价值的时候，共同的精神价值便内化为农民的精神共同体的核心要素；当精神共同体对个体的凝聚和辐射作用越大也意味着生活共同体更加稳定，农民生活品质提升就有了依托的载体。

詹姆斯·斯科特认为，农民首要关注的是“生存安全”问题，这是他们自主性意识的主要目标，任何能够给他们解决生存安全的措施，农民都会表示热情的欢迎。国家促进农村发展过程，农民虽然更多体现反应性意识，但是这种反应性意识主要是以自主性意识为参照系的。如果没有这个自主性的参照标准，反应性意识就会发生转向和变迁。这就需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农民的利益诉求、权利发展和农民生活品质提升的需求，进一步深化研究乡村的各种资源优化配置、各项政策制度成龙配套、治理策略和手段的调整、公共物品和服务提供、基层制度建设及农民信仰与意识形态社会化整合等来建构农民生活品质提升的新路径。